

doi: 10. 13582/j. cnki. 1672 - 7835. 2015. 05. 021

1951 年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 代表权立场转变的原因

张尔葭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1951 年 2~6 月,英国由赞成中国联合国代表权转向支持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美英特殊关系外,英国立场的转变还在于联合国的投票形势对新中国不利。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加入朝鲜战争,对战事扩大的恐惧开始在联合国蔓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始怀疑新中国能否遵循联合国宪章共同维护和平,新中国的加入是否会增加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砝码。英国在分析投票形势后认为,此时并非新中国争取联合国代表权的时机,故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

关键词: 投票形势; 联合国代表权; 中英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7835(2015)05 - 0118 - 06

On UK's Stance towards New China's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 Changed in 1951

ZHANG Er-jia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From February 1951 to June 1951, UK changed her stance from approval of altering China's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 to the support of suspending the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Beside the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U. S. A and the UK, the change of UK's stance lies in that the situation for voting in the UN was unfavorable for the new China. As the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got involved into the Korean War,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UN, including UK, feared the war would expand, and they started to doubt whether the new China would follow the cooperative spirit of the UN Chart and mutually preserve the peace. In addition, it was doubted whether the new China's access to the UN would add the political weight of the Soviet Un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fter having analyzed the situation for voting, UK believed that it was not the good time for the new China to strive for her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 thus UK voted for postponing the above discussions in the UN agencies.

Key words: situation for voting;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 Sino - British relations

“紫石英”号事件后,英国下院便有议员提出应该在联合国中接纳中国共产党政权代表中国^[1]。新中国成立之后,英国明确表示将支持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但同时英国一直对联合国关于驱逐中国国民党当局代表的提案投弃权票。1950 年 10 月 12 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召开,苏联代表分别提出驱逐中国国民党当局代表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两个提案,英国代表第一次全都投了赞成票。朝鲜

收稿日期: 2014 - 12 - 12

作者简介: 张尔葭(1989 -),女,湖南湘乡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宗教、中英关系史研究。

战争以后,英国虽对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投了赞成票,但这并未影响它坚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2]。英国和印度、法国一样,曾希望通过欢迎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使中国主动退出朝鲜战争。1951年2月21日,艾奇逊以极为恳切的措辞致电贝文:“如果中国共产党坐在联合国组织里然而同时对抗联合国的力量将削弱2月1日决定(谴责新中国为‘侵略者’)获得的成果,这将造成美国和远东公众的迷惑。”“去年,亚洲经济委员会提出希望在更高级的机构中解决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时,英国代表团投了弃权票,这一次,和去年类似的提案,如果英国不支持的话,是否也可以投一次弃权票?”^{[3]41-42}2月23日,贝文与美国驻英大使吉福德就艾奇逊的来电进行了讨论。但贝文表示“我们这一政策(投赞成票)同我们承认新中国的考虑是一样的,即在我们看来,它应由事实而非道德因素决定”。并且提到扬格认为“如果我们再次退回到我们的之前的(投弃权票的)决定,将对协商解决问题毫无帮助。”^{[3]40-41}1951年3月31日,扬格致电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时评价美国“情感迷惑了理性”,“美国人对联合国抱有的观点是,它是一个有效的世界警察组织,它最基本的任务是打击和惩罚国际犯罪,无论那些罪犯是谁无论他们的力量有多大。虽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远期目标,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种暗示是很危险的,它将加速世界分裂为两个装备武器并充满敌意的阵营。我们更愿意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以和平解决争端为最基本任务的组织。以此为理念,联合国应该接纳或者致力于接纳一切有任何重要性的力量,包括那些意识形态、表现令我们生厌的国家。只有这样,它才能扮演我们希望的调解角色。”扬格甚至提到“如果共产党提议退出联合国,他们将希望制造一个可以成为他们离开的合法理由的事件。对中国的继续排斥将可以被他们用作‘合理理由’。”^{[3]61-62}然而,1951年6月4日,英国外交部通知其各驻外使团,鉴于中国政府毫不妥协的立场,英国政府决定暂时投票赞成在联合国各机构中推迟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该政策拟于6月5日召开的托管理事会上付诸实施。

1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国际影响力日渐衰落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虽然作为反法西斯盟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英国的相对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经济上,如丘吉尔所言,英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者”^{[4]20}走出二战。经济上衰微有更深远的政治回音,学者斯曼用“戏剧化”来形容衰落的英国,因为“一个成熟的思想 and 政治技巧的大国却必须时刻向美国表明自己是它的同盟来确定自己有参与商讨国际事务的权利”^{[5]486}。由于英国防务战线过长而实力有限,英国只能优先考虑本土安全,放松了对英联邦国家的管理,无法对这些国家的离心倾向快速、及时回应。

应该看到,英国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威胁要比身处其中、日夜猜忌、备受煎熬的亚洲国家小很多。毕竟,英国对共产党的恐惧主要是在欧洲地区,其在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是对华贸易和中国香港。新中国成立以后,英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百废待兴之际不会引发经济的大地震,也不太可能有力量颠覆英国在中国香港的统治。但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不同,新中国的壮大意味着共产主义理论是可行的,而它的辐射可能超越国界,延伸至广阔的东南亚地区。更令他们恐惧的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占国家很大比重,他们的革命性很强。

1950年1月10号,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就“是否承认新中国”展开讨论,八个国家中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公开表示他们赞成承认新中国,另外四个国家——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新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承认新中国不会让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任何实质变化,因为英联邦国家只给它带去过敌意。”而且,“新中国政府很容易对东南亚的安全造成威胁,也许不是公开的行动,而是由中国少数民族和当地共产党组成的潜在的‘第五纵队’。”^[6]会议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长还表达了英联邦国家无法形成统一意见的遗憾,澳大利亚部长甚至建议英联邦国家团结起来在东南亚建立起反共的堡垒,虽然这个建议并没有被英国重视,但它鲜明地反应了英联邦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即便澳大利亚离中国本土有一定的距离,也弥漫着恐共、反共的硝烟,甚至认为新中国“很快会侵犯朝鲜和印度……这个‘红祸’对澳洲造成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7]130}

英国在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英联邦国家——马来亚也陷入一片恐共的气氛中。20世纪40年代后

期和50年代,马来亚出产了世界天然橡胶和锡产量的将近三分之一,带来了巨额外汇。也是这一时期,马来亚共产党势力迅速扩大,它的马来成员很少,支持者几乎全是那些贫困的华人移民^{[8]195}。被称为“共恐分子”的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员通过游击战,快速击毙橡胶园主、锡矿主、警察等,极大威胁到马来亚的经济和安全。1948年6月,英国的东南亚事务总监察,1946年至1955年间英国派驻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资深官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曾马来亚电台谴责共产党煽动分子“正凶凶极恶地试图强行实施暴力统治”^{[8]201-202}。

二战的结束,意味着战争这条连接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线也消失了。英联邦国家开始从现实而非传统出发考虑与英美的关系。如此一来,英国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其利益继续采取暧昧的“骑墙政策”,在某些时候更注重倾听英联邦国家的意见,重视他们的情感诉求也成为必然。

2 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强硬态度引发了亚洲国家的担忧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9月4日英国联邦关系办公室曾致电伦敦,认为“争取中国的代表权问题的时机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前成熟”,并认为“北京代表在大会上的态度显然将极大地影响大会对其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要求外交部给予尼赫鲁建议^[9]。虽然联合国大会最终拒绝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但是英国和印度积极地开展了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游说工作。1950年上半年的投票形势曾一度对中国共产党有利,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刚收到叶公超打来的一份电报,其情辞相当急切。他说,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第一,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似已深受英法两国的影响,为了在朝鲜恢复和平,以至不惜姑息中共;第二,各方甚至相信北平和莫斯科之间的观点存在分歧;只要能够精心利用这种分歧,就有可能说服并诱使毛泽东的政权走铁托的道路。第三,一旦中共派来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代表团到达纽约时,各方面将竭力同他们建立直接联系,只要他们表现出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可以圆通之处,有关方面将无忧不顾以联合国的代表权作为诱饵,吸引他们达成谅解。第四,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再次宣布,美国不打算使用否决权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叶指出,虽然这一点原是美国既定的政策,但在此开头予以重申,肯定是有其用意的”^{[10]163-164}。但是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进入朝鲜,特别是伍修权在美国发表了立场坚定、言辞严厉的演讲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时任远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曾宽慰顾维钧“英国和印度确实为北平政权进入联合国奔忙。但是他(腊斯克)相信,朝鲜最近局势的发展和伍修权在联合国的演说,已经使他们泄气了……最近几天发展的情况,使其他的国家更不可能这样做了。”^{[10]170}(笔者注:伍修权在演讲中曾明确表示北平将继续支持越盟斗争)菲律宾大使伊利扎尔德在与顾维钧会面的时候也表示,由于伍修权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演讲中多次提到菲律宾,他感到很紧张,因为菲律宾的胡克就是共产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对菲律宾“很感兴趣”^{[10]180}。

如果此时英国投赞成票,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之一,将会在资本主义阵营掀起轩然大波,并对东南亚英联邦产生极大影响。1951年3月27日,英国外交部致电给英国驻海外的所有代表“我们意识到当人民政府在继续他们糟透了的表现时,许多国家不像我们这样以有效控制国家作为承认准则,而以表现为承认准则的国家会继续他们反对改变中国代表权,并且这一立场在联合国大多数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国被广泛接受。”“联合国是一个在民主原则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出于对大多数决定的尊重,我们将会遵守大部分成员国在每一个有能力决定此事的组织中就这一问题上的决定。”^{[3]57}

3 新中国能否遵守联合国原则成疑

二战前英国曾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国联,二战后又将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希望建立一个可以维护和平局面、世界广泛参与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但是联合国几乎成了美国的反共组织,占联合国绝大多数席位的发展中国家未能有意识地行使权力,发展联合国维和促发的作用。“与拉美国家相比,亚洲广大人口所拥有的选票简直少得可怜。而拉美国家对亚洲事务很少或几乎没有兴趣。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本意识不到对它们来说是如此遥远的地区存在的危险局势”^{[11]143}。在

英国看来, 新中国是维护联合国尊严必不可少的力量, 它将极大地团结亚洲国家。英国认为“联合国应该是一个自由吸收不同人群和民族观点的组织”^[12]。即使在 1950 年中, 中国共产党对马来亚共产党运动的支持, 危及到英国的殖民地利益, 英国仍然认为“联合国不能在缺失两大力量(新中国和苏联) 的条件下运作”^[13]。可见, 英国希望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可以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通过协商、合作解决问题。

在朝鲜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下, 英国认为新中国的加入也有助于联合国解决棘手问题——“如果大部分安理会成员同意接纳新中国, 目前在朝鲜的艰难形势也许可以避免……在未来, 中国在朝鲜半岛将有着比任何国家更多的利益, 除非新中国加入安理会就朝鲜问题并同其他国家展开适当的协商, 否则朝鲜问题得到永久性、满意的解决希望将十分渺茫。”^[14]

另外, 英方一直防范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活动。英国力促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一个原因, 便是希望《联合国宪章》能约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英国相信“如果北京政府加入联合国, 他们将会更少地倾向于在朝鲜、西藏和印度支那的冒险活动。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内和联合国外的行为可能是很不同的……如果在被允许加入之后, 它(新中国) 仍然不顾联合国擅自行动,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并及时重组联合国, 只允许那些被证明可以在联合国规则之下合作的国家加入。”“中共应该先遵守联合国宪章才能加入联合国”^[15]。艾德礼游说美国的时候也提到“从法律上讲, 如果你否认它代表这个国家, 你就无法要这个政府对它所做的事情负责。”所以在英国的决策者看来, “一旦中共代表进入了联合国, 就有可能利用联合国的原则来对付它。只要它留在联合国外面, 就不可能这样做。”^{[16]485}

新中国正式介入朝鲜战争后, 英国便有了要求“推迟对新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赞成”的声音。1950 年 11 月 30 日, 艾登曾在下议院发言“卫生部说‘他们(指中共) 没有变。’我认为既然中共侵略(朝鲜) 的活动正在进行, 现在就不适合力荐他们加入联合国。”“我们必须投票, 但是中国如此的表现让我觉得投赞成票很难。”^[17]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节节胜利, 甚至直逼南朝鲜, 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服从《联合国宪章》, 这时候让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也许只会任其破坏联合国的合作、协商的精神。

英国本来对伍修权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寄予很大希望, 认为“这位代表能够多少指出中国对朝鲜的意向”, 通过各国主动和中国代表团联系能够通过讨论解决问题。但是“不幸的是, 这些希望都没有实现。代表团的领导伍修权在联合国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甚至过度的演讲中清楚表明中国政府唯一能接受的解决朝鲜冲突的方案是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离, 中国人民政府代表中国获得联合国的席位, 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3]44}就连英国政府也认为, 伍修权的这些演讲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妥协, 不会愿意通过联合国的协商和谅解精神与其他成员国达成共识, 新中国是否能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是值得怀疑的。

最终彻底改变联合国舆论导向的是 1951 年 1 月 17 日, 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关于朝鲜停火的方案。这一方案是 1950 年底由 13 个亚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共同商议后提出的, 并且按照联合国的程序, 通过了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审议^{[18]81-82}。对联合国成员国来说, 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 中国是没有理由反对的。美国也以此为契机, 向联合国提出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由于提案最后通过, 中国被诬蔑为“侵略者”。美国借此大做文章“在共产党军队正在从事反对联合国军的战争时, 让他们进入联合国将严重影响 2 月 1 日联合国通过的谴责中共为侵略者决议的效果, 会在中国和整个远东地区造成混乱。”^{[19]22}这样, 英国想说服成员国赞成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是不可能的。

4 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降低

随着英国计划的不断受挫, 就连英国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关于新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定位。

英国一直以来支持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希望借此离间中苏。大部分英国议员认为苏联并不希望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推迟让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只会使中国更加坚定地、亲密地加入与莫斯科的联盟中……俄国更希望中国与西方力量隔离开来。”^[20] 贝文在命弗兰克斯转交

艾奇逊的电报中将新中国同南斯拉夫做了类比“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如果铁托对与西方发展友好的关系不抱任何希望,如果南斯拉夫不是联合国成员国,铁托是否会与莫斯科决裂?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如果西方对它继续怀有冷漠的敌视态度,即使出现了它想摆脱莫斯科的时机,它能够认为除了维持与莫斯科的关系之外还能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吗?”

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中国一直与苏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虽然这些援助后来被证明并非无偿的)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苏联也一直给予支持意见。腊斯克与顾维钧会谈的时候曾认为“十之八九,伍的演讲稿是俄国人替他写的。(据说安东尼·艾登曾在英国下院说过,那次演说除了稍微长了一点之外,听来活像是维辛斯基在讲话。)”^{[10]168}谴责新中国的“侵略者”提案特别是对中国的禁运提案的通过,使得新中国更加反感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这些事件实际上为发展中苏关系提供了契机(因为只有苏联和印度极力反对这一提案)。另外,在战争结局尚未可知的时候,赞成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毫无疑问会鼓舞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就朝鲜战争来说,这对前线正在参战的联合国军战士将产生不良的影响。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致电伦敦,认为“投票赞成一个正在战场上与英国人交战和被最高的国际权威机构谴责为侵略者的国家进入联合国”很难合法化^{[11]389-394}。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北京取得安理会的代表权,那它对台湾的要求就难以回绝^{[21]102}。另外,新中国的加入,“会之前因为苏联缺席而出现的美英操纵的联合国局面不复存在。如果苏联重返联合国,它们将充分行使否决权。”^{[22]58}这对于整个资本主义阵营是极具威胁性的。这一系列考量最终都成了新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的严重障碍。

总之,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与美国就这一问题发生正面冲突,这样也有助于维持美国对英国在诸多地区(特别是这一时期形势最为严峻的埃及)的防御帮助。中英双方在这一时期都没有接到对方传递的正式建交的信号:中方对英国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并未对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仍然努力游说他国的英国给予任何肯定;英国对“延时审议”的赞成毫无疑问是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以便为日后的行动留有余地,但是在客观上再一次将中英正式建交的机会贻误了。英国再次选择了跟随美国政策,不仅令中国共产党丧失了对英国大国作用寄予的希望,使得联合国继续作为“反共集团”,名不符实。更造成了英国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新中国继续实行这种暧昧政策,即便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作为工党领袖的艾德礼曾多次提出应尽快解决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但“由于保守党极大地延续了工党的外交政策,使得工党难以作为反对党批判它,所以也限制了工党作为反对党的作用”^[23]。

参考文献:

- [1] Parliament debates, 05 May 1949. CHINA (BRITISH POLICY) . Vol .464 cc1224 - 349 [DB/OL].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49/may/05/china-british-policy#S5CV0464P0_19490505_HOC_291 [Accessed 6 March 2011].
- [2] Parliament debates, 01 February 1951. KOREA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 Vol. 483 cc1082 -9 [DB/OL].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51/feb/01/korea-united-nations-resolution#S5CV0483P0_19510201_HOC_315 [Accessed 15 March 2011].
- [3] 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E Asia 1951. China, Japan and Korea, 1951. Vol. 1 [Z]. LexisNexis 2006.
- [4] 张顺洪. 大英帝国的瓦解[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5] L. C. B. SEAMAN: Post - Victorian Britain 1902 - 1951 [M].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66.
- [6] Commonwealth Ministers Discuss China [N]. Times, 1950 - 06 - 11.
- [7] Humphrey McQueen, Australia's Media Monopolies [M]. Camberwell: Victoria Australia, 1977.
- [8] 布赖恩·拉平. 帝国斜阳[M]. 钱乘旦,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9] Relations wit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China on Formosa: Divergence of views between Britain and USA over Formosa,

1950. 08. 20 [Z]FO371/83299.

- [10] 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第七卷第八分册) [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1] Yasamee H J, Hamilton eds K A.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 2, Vol. 4, Korean War, June 1950 – April 1951 [M]. London: HMSO, 1991.
- [12] Parliament debates, 30 November 1950. FOREIGN AFFAIRS. Vol. 481cc1330 – 440. [DB/OL].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50/nov/30/foreign-affairs#S5CV0481P0_19501130_HOC_401 > [Accessed 12 March 2011].
- [13] Major Tufton Beamish MP to Mr Davi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fear that expansion of China will include British colonial territory [Z]. FO371/83304.
- [14] Parliament debates, 30 November 1950. FOREIGN AFFAIRS. Vol. 481 cc1330 – 440. [DB/OL].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50/nov/30/foreign-affairs#S5CV0481P0_19501130_HOC_401 [Accessed 12 March 2011].
- [15] Parliament debates, 30 November 1950. FOREIGN AFFAIRS. Vol. 481 cc1330 – 440. [DB/OL].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50/nov/30/foreign-affairs#S5CV0481P0_19501130_HOC_401 [Accessed 12 March 2011].
- [16] 杜鲁门.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 [M]. 李石,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 [17] Parliament debates, 28 March 1950. FOREIGN AFFAIRS. Vol. 473 cc189 – 333 [DB/OL].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50/mar/28/foreign-affairs#S5CV0473P0_19500328_HOC_313 [Accessed 10 March 2011].
- [18]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 – 1951)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 [19] 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C, North America 1951, Vol. 1, United States, 1951 [Z]. Lexis-Nexis, 2005.
- [20] Parliament debates, 30 November 1950. FOREIGN AFFAIRS. Vol. 481 cc1330 – 440 [DB/OL]. 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50/nov/30/foreign-affairs#S5CV0481P0_19501130_HOC_401 [Accessed 12 March 2011].
- [21]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 British American Relations, 1949 – 1958 [M].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2] David Clayton. Imperialism Revisi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950 – 1954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 [23] Randy Rowan. A Foreign Policy in Opposition: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Far East, 1951 – 1964 [D]. Texas: the Graduate Faculty of Texas Tech University, Doctor of Philosophy, 1992.

(责任校对 龙四清)